

马来华语文学研究中“中国性”与“本土性”的辩证关系

Tan Kok Wei

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摘要】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起源与发展继承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思想与精神。因此，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国性”的研究是其研究的核心思想和切入点。随着独立运动的发展，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以本土化的“本土性”建构为基础，并因其本土化的“独特性”而备受关注。然而，“本土性”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关于“去中国性”的争论。因此，通过对“本土性”的持续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性”与“本土性”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本土性”源于“中国性”，其内在基础无法脱离“中国性”的内涵。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本土性”，并将其与“中国性”重新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主体性。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中国性；本土性；身份意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13 日 **【DOI】**10.12208/j.jlar.20250001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ness” and “Nativeness” in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Tan Kok Wei

Research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Cul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Abstrac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herit the ideas and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ness”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main idea and entry point for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veness” of localization, and it has also attracted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uniqueness” of localizat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ness”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debates about de “Chineseness”. So, with the continuous in-depth research on “Nativenes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ness” and “Nativeness” is actually a state of interrelated entanglement. “Nativeness” comes from “Chineseness”, and its inner foundation is not divorced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n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understand “Nativeness”, and reconnect it with Chineseness, and based on this, we developed the subjectiv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ness; Nativeness; Identity consciousness;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1 引言

“中国性”和“本土性”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中两个较为常见的概念。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初期定位可以被视为华人侨居文学，其作品大多出自即将南下求学的文人雅士之手，因此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底蕴、意识和元素。与此同时，中文

报刊的兴起不仅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提供了发表平台，逐渐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形成了一个文学领域，也参与了华文文学潮流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并肩负起民族意识传承的责任。最终，这将反过来影响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创作意识。对“中国性”的研究正是挖掘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的这种意识和元素。

随后,当这些文人雅士在“南洋”生活¹一段时间后,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生活经验,并通过创作将其加以描绘。这种“南洋写作”逐渐孕育了“本土性”的种子。然而,随着二战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独立运动的兴起,马来西亚华裔作家的本土意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国家的独立迫使当地华人做出选择:如果他们选择留下,就必须舍弃他们的海外身份认同。因此,马来西亚华裔文学界引发了关于“马来西亚华裔文学艺术独特性”的讨论,并最终确立了以描绘“此时此地”为创作方向的理念,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作品。

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中国性”与“本土性”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两种视角迥异的研究方法,早期文学界对二者也分别进行探讨。20世纪,马来西亚华文学界围绕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发展方向展开了两场辩论,其本质在于“中国性”与“本土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艺术独特性”的辩论正值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时期。为了回应独立运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提出了“独特性”的创作概念,以描述“此时此地”的现实,从而摒弃了“离散文学”这种描述华人社会现实的创作方向。“独特性”是“本土性”的开端,“离散文学”则是“中国性”的前身。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吴锦洲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就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定位、“经典缺失”以及文学史的写作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发了当地学术界的诸多争论。然而,无论研究视角如何变化,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推进“独特性”的探索,并建立真正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的主体性。因此,台湾学者提出了诸如“去中国性”、“断奶理论”等观点。20世纪下半叶,“中国性”与“本土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在21世纪,“中国性”与“本土性”不再相互冲突,而是成为两种独立的研究对象。对于“中国性”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索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背后的中国意识、中国文学意象和文化怀旧情结,例如王烈尧的《从故乡情结到故乡神话——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中的中国想象》。至于“本土性”的研究,则存在两种研究思路:第一种以朱崇科的《文学考古“南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本土性与华人文学》

为代表,该研究梳理了文学史,并探讨了文本中的南洋特征;第二个研究思路是探讨和反思20世纪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界关于“中国性”和“本土性”的两场学术辩论,例如朱文斌的《从“外来意识”与“本土意识”之争的角度研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独特性和主体性的建立》。

如果我们继续探讨“本土性”研究的第二种思路,就会发现“本土性”研究无法脱离“华人性”的背景。这一现象源于三个原因:首先,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领域自建构之初就具有培育华人意识的功能;其次,“本土意识”的发展伴随着与“华人性”的决裂;第三,马来西亚独特的多元文化共存与分化的社会形态,使得马来西亚华人在意识层面形成了“华人性”与“本土性”的对立统一。因此,只有通过二者进行辩证的探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质。虽然该领域已经有一些研究,例如许文英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中的三条河流并流:中国性、本土性和现代性之间微妙的相互建构》和朱崇科的《本土性的纠缠:中国文学史主流写作简述》,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做的^[1-2]。

此外,进一步探讨“华人性”与“本土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为了将其作为构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或“马来西亚华人意识”的基础。这一概念由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学领域的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源于马来西亚华人自独立以来“华人性”意识与“本土性”认同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两者都是华人“主体性”的基础,二者不可分割,因此,诸如“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或“马来西亚华人意识”等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的发展尚待完善,仍需学术界的持续努力。

2 对中国性和本土性概念的辨析与分析

“本土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再次分析这两个概念。原因在于,“中国性”的概念极其复杂,涉及诸多领域,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而“本土性”的概念相比“中国性”则显得过于肤浅。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研究中,为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找到一个立足点。

¹中文中对东南亚的古称。

2.1 中国性

“中国性”概念的出现，一些学者追溯到西周时期，其基础是“华夷之争”。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汉族逐渐形成了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到了近代，这种文化交流的对象变成了西方文明，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也包含了前现代意识与现代意识的碰撞，最终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将文化融入“中国性”的内涵改革，并将其作为构建符合现代观念的中国民族意识的工具，以实现民族现代化转型和民族复兴的目标。由此可见，“中国性”的最初含义在于中华民族在文化层面的自我认知和概括，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意识和“想象的共同体”。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遍布世界各地，对于选择移民并改变国籍的海外华人来说，移民后如何面对自身中华文化与移居国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由此，海外华人的“中国性”问题及其研究应运而生。然而，海外华人研究中的“中国性”概念与前文讨论的“中国性”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尚存疑问。刘晓欣曾指出，海外华人研究中的“中国性”概念可能源于王赓武在其著作《中国与海外华人》中提及的“中国性”一词。此外，吴晓安认为“中国性”一词是从“白人性”研究中借用的。其次，“中国性”一词目前尚无学术界公认的中文翻译，因此，尽管可以译为“中国性”，但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华人性”。“华人性”和“中华性”。与中文翻译类似，“中华性”目前尚无标准定义，会因语境不同而呈现多样性。因此，“中华性”的概念具有动态属性，会随着地域、社会环境和文化现象的变化而变化。这更多地源于海外华人与其居住国之间的巨大差异。除了“中国人”这一共同身份认同之外，由于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必然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中华性”的界定和理解也随之改变。

尽管海外华人研究中的“中国性”概念已被赋予了动态特性，但它仍然具有其基本特征：它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文化和汉语为身份认同的基础，并通过共享中国历史背景和儒家价值体系，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得以合理存在。简而言之，“中国性”是海外华人的“中国意识”、“中国特色”和“中国属性”。至于后三个概念的

内涵，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补充。“中国性”建构“身份认同”的功能或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民族意识的建构，并逐渐演变为“中国”民族认同或海外民族认同。这种“持续认同”，依托海外传承的中华文化和汉语的使用，共同构成了一种广泛关联的情感基础，从而产生了海外华人的“离散意识”或文化怀旧情结，尤其体现在文学领域。因此，“中国性”更适合表达“中国性”的基本含义，而“中国化”的翻译则基于海外华人将“中国身份”置于文化层面的视角。至于“华人性”，其切入点在于强调其动态性和流动性。

尽管海外华人学者倾向于强调“中国性”的动态属性和流动性，以探寻“中国性”的本质或中心化话语模式，即“中国性”的内涵，但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华人性”层面，这使得学者更容易调和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文化的异质性。然而，本文以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为语境进行探讨，因此选择“中国性”这一译法，因为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中，更多学者选择使用这一术语；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对“中国性”的研究也确实更侧重于“中国性”的内涵。因此，本文下文中对“中国性”的表述均指“中国性”的内涵。

文学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但马来西亚华文学术界对“中国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吴金秋发表了多篇文章，反思并批判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的怀旧情结。在《中国性，或存在的特殊历史性》一文中，尽管其重点在于回应一些学者对其表达的对马来西亚华文作家过度涌现的文化怀旧情绪的批评，但也提出了中国文学研究中“中国性”概念的最早范畴，即“中国特色”和“中国本质”。随后，吴金秋在《中国性与表演性：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局限》一文中总结了“中国性”的历史背景：“中国性”是马来西亚华人构建“想象共同体”的过程。最初，它是为了回应当时中国的现代化革命并为其提供支持。因此，通过汉语教育和中国文学，一种与“祖国”命运相连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华人社会中得以构建，并以“语言文化”为基础。马来西亚独立后，“华性”成为定义“华人”族群的核心内容。此外，其他学者也梳理了“华性”的背景渊源。例如，林春美从中国情结的视角分析“华性”，挖掘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心中隐藏的中国

情感和观念,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怀旧的根源。郑金东则重新梳理并诠释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由来已久的联系。例如,他指出,由于华人社会教育的匮乏和文化等级结构的薄弱,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发展初期只能借助中国文学体系,使用相同的书面语言,来实现传播启蒙和现代思想的目的。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走上本土语言改革之路。由此可见,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中,选择“中国性”这一译名更为恰当。

中国文学的起源、华人“族群”身份的建构以及文化怀旧,不仅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中“华性”内涵发展演变的体现,也是“华性”研究的三大要素。它们最初被置于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意识”身份认同之下。到了20世纪40年代,马来亚进入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本土意识的建构势在必行。那么,以“离散意识”为主导的“华性”是否会随着“本土性”的兴起而被抛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顾“本土性”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其特征。

2.2 本土性

“本土性”源于“南洋文”。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在作品中展现新思想,一些作家将东南亚的生活经验和地方风俗融入到作品中。然而,最初只是为了创造新思想而进行的“南洋文”很快被一些文学副刊的编辑们认可、推广和发展。一方面,受“新兴文学”概念的影响,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开始尝试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文学艺术,因此开始倡导文学作品应积极描绘地方风俗、历史文化、生活场景等,“南洋文学”、“地方色彩”、“南洋”等词汇相继出现。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在南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将这里视为自己的故乡,于是他们开始提议进一步推广“南洋文”,以实现“南洋文化”的建构。例如,《椰林》杂志主编陈连清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提出,我们应该“站在南洋的位置上发声”,以南洋为中心,强调南洋地区的独特性。黄正福指出,海外华人总是认为自己仍然是生活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却忽略了海外华人身份早已“固定”的事实,因此他们总是忽视属于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学术文化的建构,他呼吁海外华人“.....要意识到海外华人将东南亚视为自己的故乡,我们不能再轻视它了”^[3]。

1934年,费铭(邱时珍)发表了《论地方作家》

一文,提出了“地方作家”的概念,指出“地方作家”是指为“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学艺术创作做出贡献的作家。同时,鉴于当今现代文学艺术已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基调和潮流的产物,因此,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扶持马来亚地方作家,构建和发展马来亚地方文学艺术。尽管费铭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其论点也并非新颖,但它的贡献在于清晰界定了马来亚“地域”的边界,使得“马来亚文学”的概念得以出现和运用。此前,“南洋文学”中的“南洋”一词过于抽象模糊,虽然可以理解为指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学,但毕竟“南洋”一词原本可以涵盖东南亚国家,其范围不够明确。“本土作家”和“马来亚文学艺术”的出现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从地域范围上看是如此。然而,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无论是“南洋文学艺术”还是“马来亚文学艺术”,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当时新马来西亚地区的现代国家尚未形成,缺乏一个清晰的“国家”为其提供基础,因此“南洋文学艺术”和“马来亚文学艺术”始终缺乏真正坚实的发展基础。

因此,直到20世纪4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意识”才得以在整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艺术界发展起来。此时,马来亚华人经历了二战期间的抗日战争,战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殖民主义和独立运动兴起,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开始重视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的构建,这也影响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1947年,在新加坡侯格公立学校举办的作家研讨会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艺术的独特性”这一概念被提出并展开讨论。这实际上是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探讨:是继续走散居海外华人、描绘华人现实的道路,还是选择走“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艺术的独特性”之路,反映马来西亚的本土现实。这场讨论随后被刊登在报纸副刊上,引发了诸多不同意见,以至于新加坡华文文艺协会于1947年11月再次举办研讨会,希望就此问题征求意见。最终,与会作家一致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艺术具有其独特性。吉隆坡的《战友》杂志也刊登了周荣《谈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艺术》的摘要,该文阐述了文学在“此时此地”现象表现上的独特性,并探讨了独特性的实践意义。然而,该文也指出,“海外华人”作家不熟悉当地社会环境,因此无法创作反映当地现实的文学作品,“海外华人文学艺术”在文学上并不独特。这种观点引起了

部分作家的不满，并引发了关于“海外华人文学艺术”创作理念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艺术独特性”的辩论。

关于这场辩论的最终定论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艺术独特性论》，该论著于1948年兴华文艺协会第二次研讨会后完成。在这场辩论中，“独特性”最终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因此本文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独特性”的动机在于，当时大多数华人已决定投身于本土民族运动，因此华文文学艺术应当聚焦本土政治事件，纠正以往过分强调中国主题的偏见。“独特性”的含义强调写作形式的“本土性”和“此时此地性”。其次，否定“中国文学艺术”与“海外华人文学艺术”的划分，例如以中国为主题的写作，可以直接归入“中国文学艺术”的范畴。第三，展望马来西亚华民族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民族运动，希望马来亚各族群的反殖民力量能够团结起来，共同为独立运动而努力。在这方面，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界正式开启了构建“本土意识”的道路。

“本土性”在文学批评层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拓展了所谓“本土性”、“此时此地”的丰富内涵，例如后殖民多元文化社会现象、独特的多语混合写作风格、雨林写作等文学特征。在学术层面，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性”概念的合理性表示质疑，认为其根源仍深植于中国，并提出了完全“非中国式”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概念，但这一观点最终未能被当地学术界接受。此后，更多学者对“本土化”的发展及其特征进行了回顾、反思和总结，其中朱崇科是代表学者。例如，他将“本土性”特征划分为本土色彩、本土话语和本土视觉维度。地方色彩，即地方自然风俗、文化景观和地方语言混合现象的展现；本土话语是“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历史背景下对汉语的重构和发展，其中包括本土意象、本土后殖民话语等”^[2]；地方视野是地方视野、思维和精神的体现，是马来西亚华人特征自我表达。

“本土性”的整体发展历程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本土性”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与“中国性”的对立争论，但是“本土性”本身除了上述表面发展之外，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不同于“中国性”的本质和核心概念？

3 中国性与本土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来西亚的独特性“中国文学和艺术”不仅是先前“南洋文学”、“马来文学”以及其他基于本土创作理念的集大成者，也是马来西亚“本土化”的开端。中国文学的核心概念是“马来西亚的独特性”。“中国文学艺术”强调并关注对“此时此地”的描绘，其创作方向必须反映马来亚社会的现实，密切关注当地的民族、社会、政治等问题，最终通过聚焦地方社会现象来实现培育地方意识和民族认同的使命。因此，可以说现实主义是社会快速变革时代文学界最受推崇的创作理念。在编辑马来西亚历史的过程中……方秀非常重视中国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并认为它们是马来西亚文学的特征。中国文学，并概述了马来西亚的历史中国文学作为马来西亚现实主义潮流发展史中国文学。因为他对马来西亚历史的贡献方修在中国文学中开启了马来西亚“现实主义传统”的视角。中国文学批评主导了马来西亚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方向。一段时间内研究中国文学。

“独特性”是“本土化”的基础；“现实传统”是“独特性”的基本理念。然而，马来西亚的“现实传统”中国文学与马来西亚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方修曾说过：“马来西亚文学……”中国文学创作就是接受中国文学传统，而中国文学传统主要是现实主义的^[4]。马来西亚中国文学重视文学的社会实践功能，这受到中国文人所传播的左翼思想潮流的影响，例如1927年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与马来西亚的文学运动产生了共鸣”。中国文学艺术圈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贡献^[5]，由此进入现实主义道路，发展出南洋色彩文学和抗日文学的文学主题。苗修在其文章《论侨民意识与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性》中也指出，“随着马来亚殖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如今的新阶段，文学艺术必须争取独立发展以应对这一新的历史任务，因此必须将外来事物转化为自身事物，并将从中国引进的新文学艺术扎根于马来西亚的土壤。”中国文学运动^[6]。显然，在源头上，“本土”和“中国”可以说是同一种脉搏。

所以，从核心概念上讲，“本土”可以与“中国”分开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从新加坡首任中国领事左平龙创立会贤社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马来西亚的文化发展。中国文学肩负着多项使命，即传承中华文化、持续关注中华社会现实、构建中

华民族认同,或者说,其表达方式可以转化为培育中华“文化认同意识”、“侨居意识”和“民族意识”。这三者共同构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所谓“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性”,仅仅在于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转变为“对马来西亚社会现实的关注”。由此便可回答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本土性的发展确实成功地消除了华人的“异乡意识”,使华人的目光聚焦于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并建立起一种“本土意识”。然而,“本土化”的构建也仅限于此,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绝不允许被侵犯、消除,因为这是涉及自我认同的关键意识,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未来构建“华人”民族认同的基础。方修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等同于华人移民的苦难史”^[6]、苗修的“‘国际’殖民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在体现‘民族性格’的过程中表达出来。‘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艺术’也是从这个层面获得‘民族性格’的过程。这正是我们所强调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独特性的内容(民族性)和表达形式就是‘民族形式’”^[7]等论述,都体现了基于“华性”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中的“华人”民族认同的根本性和重要性。

甚至可以说,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本土性”的核心基础是“华性”。尽管学术界历来将“华性”和“本土性”这两个概念置于同等地位,但在具体概念的定义中却存在“不平等”。例如,朱崇科在探讨“本土性”的可能性时提出,它必须基于以下前提:第一,能够“用中文写心”,即能够以中文为基础,表达其本土意识形态;第二,文化认同的重构与资源重组,民族文化认同的表达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在想象中不断重构。此外,朱崇科“本土性”特征中的“本土话语”被定义为“本土话语指的是在华文文学的历史语境下,对中文的重构与发展……”。朱崇科也曾提出“马来性”的概念,并指出应重视这一概念,否则“本土”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形成只能更多地笼罩在大中华文学的阴影之下,发展缓慢或滞后。他反复强调,“本土性”的发展是在“华性”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此外,许文英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并非纯粹的本土性(如马来文学),而是汉化后的现代本土性》,许文英也表明,“本土性”的根源在于“华性”。

因此,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艺术独特性”的发展受到了台湾部分学者的质疑。原因在于,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艺术独特性”的本土化仅限于表面,并未触及“华人”的根基,可谓是表象而非根源。因此,他们在这时期提出的“去华性”、“断奶”等论断,以及构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意在从根本上改变“本土性”的本质。台湾学者想要动摇的是“文化认同感”。他们试图摒弃以“语言文化”为核心的身份建构话语模式,转而以“种族”来定义“华人”的身份,即只保留“族群意识”,从而进一步动摇“本土性”的根基。在这方面,吴锦洲以“本土”华人为例,提出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概念,认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应该摆脱“中华文化—汉语”的局限^[8]。钟义文也提出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概念,但仅以“种族”为考量,探讨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定位的多种可能性。显然,这些观点必然会遭到本地学术界的各种误解和批评,他们“中华文学的起源不可分割”的简单论断几乎阻碍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可持续建构。至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概念,在实践中也存在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如果文学文本不局限于“汉语”,那么如何才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阅读和交流呢?简而言之,如何处理文本翻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终,诸如“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主观性”之类的概念也只能停留在概念层面。

4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依然十分必要。一方面,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受到以“马来文化”为主导的国家统一文化政策的压制,导致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中“华性”与“本土性”之争由来已久的原因之一。“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正是由此而来的一种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也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存在的文化认同困境有关: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能否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华人社群能否成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确保了中小学十二年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能以华文为教学语言,同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精神。正是凭借这种教育保障,马来西亚华

文文学得以持续发展。然而，也正因如此，尽管马来西亚华人的民族认同已深深扎根于马来西亚，但他们的文化认同仍然保留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华文教育体系的良好环境支持下，马来西亚华人逐渐构建起一个内部化的华人社会。也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下，马来西亚华人只需掌握华文语言和中华文化认知，便可终其一生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生活，而无需接触其他当地民族和文化。在这种环境下，自幼接受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其最初的文化认同便是中华文化认同，并由此形成了对文化故土的认同心理。

然而，在实际生活环境中，与马来人、印度人或其他原住民接触是常态，学习和交流马来语和英语也是必要的；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与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穆斯林文化、西方文化等的接触和交流，甚至融合，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如今所持有的“华人文化”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华人文化现象，经历了多次文化融合和洗礼，与传统的华人文化或华人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在马来西亚存在的“华人文化”可以被称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然而，除非真正接触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否则华人自身往往难以察觉。因此，华人社会将两种不同的“华人文化”混淆是正常的。旅行作家和学者的海外学习经历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证。在目睹不同国家或地区“中华文化”的不同形式后，他们会质疑自身“中华文化”的合法性，进而走向两个方向：一是回归传统“中华文化”，例如以温瑞安为代表的“神州诗社”作家；二是赋予“中华文化”合法性，这正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学者所致力于实现的。即便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与“马来华人文化”之间的相互混淆或矛盾现象在马来华人社会依然普遍存在，因此，“马来华人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仍不能完全放弃。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最初是为了解决上述两种“文化意识”之间的冲突而提出的。将其置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华人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分裂为“华性”和“本土性”两种状态。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华性”与前述的“华性”有所不同。前述的“华性”由“离散意识”、“文化认同意识”和“族群认同意识”构成，是主体身份建构的

核心。而此处所谓的“华性”则基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中国特色”，例如文化怀旧和华文文学的历史渊源。他们最初依靠“离散意识”，并通过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来展现自身。然而，在“离散意识”被消除之后，它转而与“文化认同意识”相联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性”的下一个层次。但为了避免概念互通造成的混淆，或许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性”。刘晓欣的文章《乡愁、中国文学与中国性》认为，将中国文学中常用的术语“中国性”改为“中国性”或许能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学概念认知中的“中国性”，因此本文顺应这一趋势，借鉴了这一概念。

“本土性”的概念围绕着上层的“华人性”发展而来，并不断进行本土化完善。同样，“本土性”的概念也必须依附于“文化认同意识”而存在。毕竟，它是在“文化认同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但并未动摇其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意识”具有“中华性”和“本土性”两个特征。在“认同感”之下存在两个“特征”，这显然会导致矛盾。上世纪90年代，一些访问台湾的学者提出了“去中华性”的争议以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构想，试图通过动摇“华人性”的根基来确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合法性，从而解决这一矛盾。然而，最终由于“华人性”的根基过于稳固，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

即便如此，“中华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仍然需要解决。问题是，这两个概念之间真的存在区别吗？事实上，它们属于同一概念。“中华性”与“中国性”的区别在于它们所强调的本土化特征。无论是文化怀旧，还是“民族”意识，都是本土化后“中国性”意识和特征的体现。因此，在这种认知基础下，或者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中“本土性”概念的构建而言，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的“中华性”与“本土性”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既然“中华性”即是“本土性”，那么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只是一种错觉，只需去除多余的“中华性”概念，矛盾便可迎刃而解。至于用“本土性”而非“中华性”来指代，可以避免两者混淆。因此，中国“文化认同意识”中“中华性”与“本土性”的割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困境，其实是一种错觉。然而，这种错觉却造成了实际问题，因为它难以被清晰地界定。

“本土性”二元对立的幻象或许已足够，但要真正解决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认同困境，构建完整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内涵，仍需进一步研究。然而，以往基于“去中华性”的建构路径已然失败，因为这条路径行不通，无法剥离“中华性”认同的核心概念，进而转变思路，以“中华性”为基础，“本土性”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表象。之所以能够运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构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原因在于：（1）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领域自创立之初便肩负着身份建构的责任；（2）“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最初便是应用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研究。（3）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以丰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内容。“在全球化时代的离散语境下，当今华人文学创作者应重新审视过去僵化的民族性表述，致力于展现中国想象力的多元性和流动性，为‘中国性’创造更多文学可能性，从而拓宽以民族国家为思维框架的文学视野和华人文学的辐射范围”^[9]。构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路径可以基于以下三点：首先，朱崇科的“本土性”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对中国本土化意识结构的良好总结；其次，海外学术界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从现象入手，分析了华人社会多元文化交融的后殖民意识，并为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王德伟对“后移民”的探讨则立足于华人的“族群”意识，探究了其民族认同意识转变的心理历程^[10]。这三种研究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建构大有裨益，但这条建构之路尚待后人探索。

5 结论

总而言之，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华性”、“本土性”和“身份认同意识”三者相互交织。“华性”是一切的基础，它最初由中华文化和汉语构成。当“华性”跨越重洋来到马来西亚这片土地时，为了保持自身的延续性，它通过构建华文教育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体系，继续在此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意识，使马来西亚华人的目光始终聚焦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建立起自身的中华民族认同。此时，“华性”的内涵转化为“侨居意识”、“文化认同意识”和“民族意识”这三种意识，并不断延伸。在马来西亚，华人往往同时具有“华性”和“身份认同意识”。然而，随着长期身处异乡以

及时代变迁，“本土认同”和“本土性”意识的兴起已势不可挡。因此，“本土性”的建构及其与“华人性”的关系，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学领域引发了诸多学术争论，例如“独特性”、“去华人化”、“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等等。然而，经过一番争论，人们发现“本土性”的本质在于对“华人性”的本土化改良，即“华人性”是“本土性”的根源。所谓“本土性”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在消除“华人性”和“侨居意识”，并将“民族意识”转化为“族群意识”，但其内在本质却始终未变。本文旨在清晰地理解这一过程，明确“华人本性”才是根源；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主体性”则以本土性为表象。

参考文献

- [1] Khor, Boon Eng. (2010). The Three Streams Flowing Abreast in Malaysian -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ubtle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Chineseness, Indigeneity and Modernity. *Literatures in Chinese*, 1, 39-47.
- [2] Zhu, Chongke. (2003). Local entanglements—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ain line of writ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Xue Hai*, 2, 184-189.
- [3] Yeo, Song Nian. (2001).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onsciousness.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ith Eight Front Int'l Culture & Communications Ltd.
- [4] Fang, Xiu. (1976). The realistic tradi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ingapore: Oven Culture Enterprise.
- [5] Fang, Xiu. (1973). Malaysia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Singapore: Wan Li Book Co.
- [6] Miao, Xiu. (1948). On "Diaspora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pp. 257-260). Singapore: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7] Gu, Yuanqing. (2010). On Fang Xiu'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s in Chinese*, 2, 42-48.

- [8] Ng, Kim Chew. (1990). Discussion on the Full Nam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ethnic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in Malaysia. In *Spic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n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pp. 3-17), Kuala Lumpur: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with The Federation of Alumni Associations of Taiwan Universities.
- [9] Lai, Xiuyu. (2023). The Three Constructive Mechanisms of 'Chineseness': the Imagination of China with Chen Dawei, a Chinese Malaysian Poet Based in Taiwan. *Literatures in Chinese*, 3, 5-15.
- [10] Li, Song, & Chen, Guowei. (2021). Th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Cultural Identity: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laysia. *HuaXia WenHua LunTan*, 1, 335-342.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